

难忘岁月的追忆

○杨树先（1952 历史）

在母校85周年时，我在《清华校友通讯》（复33期）上，撰写了题为《寻找历史与梦萦师情》一文，这是我在近春园里漫步时回忆过去的岁月，记述了我在清华大学学习与生活的师生情和景。

2011年清华百年华诞，也是我在母校学习、生活、工作60年，再追忆一下难忘岁月中的一些情与景。

参加江西省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10月—1952年5月）

1951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出土地改革运动通知，通知上有土地改革工作团团员注意事项（共15项）和土改工作日程表。按北京市规定，高等学校组成了两个土地改革工作团：一个团赴江西省，参加的学校有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均以文科师生为主，兼有理工科的老师参加；另一个团赴广西省，由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的师生组成。

赴江西的土地改革工作团工作地点在江西省上饶专区东乡县。清华大学工作团团员由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二年级学生和老师，以及工学院的电机系和机械系的老师组成。其中教师有中文系吴组缃教授、余冠英教授、季镇淮教授；历史系张寄谦老师；精密仪器系沈力虎老师、电机系南德恒老师、自动化系吴伯纯老师。



杨树先学长2007年摄于香港科技大学

土地改革工作团团长是季镇淮，副团长是吴组缃、余冠英，秘书长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万邦儒。团员有清华大学中文系杨云若、蒙树宠、李家骏、汤炳根、吴琦；历史系张雪玲、顾栋奎、杨大之、林光异、潘天恩、刘桂生、杨树先等；哲学系羊涤生、刘锡光等。燕京大学工作团团员有新闻系秦桂、傅之朔、贾观、唐稚松、孙志芳、宗修英、李文林、肖稚英、马江林等。以上名单只是我记忆中的，肯定还有遗忘或疏漏的。

为了便于在城内听取有关土地改革的报告，土改工作团暂移驻城内辅仁大学化学楼。工作团全部成员出发前，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听取了一系列的报告：10月6日上午9：00，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作思想动员报告；17日下午2：30，原北京郊区土地改革负责人（后来曾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作《土地改革政策问题》报告；18日上午9：00，柴泽民再作《土地改革的方法与步骤》报告；19日下午2：30，柴泽民又作《如何划分农村阶级问题》报告；同时教育部司长丁浩顺作了

□ 我与清华

《知识分子下乡的种种动机、立场和学习问题》报告；21日下午2：30，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秘书长李维汉讲话；25日下午2：30，外交部司长陈农康作《关于国际形势》报告；26日上午9：00，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杜润生作《关于土改中的几个问题》报告。这些报告的笔记，至今仍保存着。每听完一次报告后，大家分组进行学习和讨论，相当热烈。这是因为大家原来不懂得什么是土地改革。

随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生从北京坐火车出发，先抵达湖北武汉，稍事休息一天，由杜润生进一步详尽地讲解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此时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位土改专家。

离开武汉抵达江西南昌，听了江西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刘俊秀的报告，具体介绍了江西农村状况。随后抵达江西上饶专区，听了黄专员介绍东乡县的基本情况。在上饶一个茶场，清华和燕京的土改工作团员分配到各乡的自然村。

我被分配到东乡县后坑村。这里的特点是山高林密，道路崎岖，人多地少。90%是佃农、贫农，他们没有土地或很少有地，有的土地很贫瘠，大多数田在山沟沟里。这时，我记起柴泽民报告中讲到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为国家前进一步就必须进行土改，肃清封建主义势力；《土地改革法》确定废除地主，阐明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简言之，土地改革不是单纯地救济穷人，而是使广大农民由贫到富、当家作主的一个重大步骤。对此，土改工作队队员要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

首先是要依靠贫佃农，不能由工作队包办代替。我们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培养苦大仇深的佃农、贫农作为骨干，由他们组织贫佃农和中农的农民协会；并由他们自己推举农协主席，再由农协主席去乡和自然村的祠堂里召开大会，并在大会上介绍土改工作队队员。

我们工作队队员分别在各自然村，挨家挨户同贫佃农谈心，并启发他们对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的认识，鼓励他们大胆地揭发地主、恶霸的种种罪行。这样逐步地提高了他们对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的认识，启发他们认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广大贫佃农住的是只能挡风遮雨的破旧草房或瓦房，而地主住的都是几进几出的高墙大院。这种贫富、被剥削和剥削的反差极大。至于吃，贫佃农吃的叫“丁菜”，即90%是菜叶、10%是米粉，两者混在一起吃。土改工作队队员是与贫佃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夜间是点菜油灯，昏暗暗的。

每当在祠堂里召开全乡大会，控诉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时，大家席地而坐，或坐小竹椅，会场上鸦雀无声，每当贫佃农控诉时，他们是声泪俱下，我们听得义愤填膺。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查清地主、富农的土地与所有浮财。

按照土地改革的政策，地主与富农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地主的土地是全部没收，分配给贫佃农。有的地主还有所谓“浮财”，即当时地主为了隐瞒财产，将自己的银元或金银财宝，埋在很隐蔽的地下，但一经查出都予以没收查封，上缴待处理。富农由于自身参加1/4的劳动，因

此，只征收他多余的土地。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就在于富农有一个“农”字。中农和富裕中农，他们都是自耕农，自己劳动，不剥削他人，有时还被地主剥削，如为地主做一些无偿劳动。因此，中农属于保护对象，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中农实际上是贫佃农的同盟军。有的小工商业者兼有少量土地，按工商业者对待，不动他们的土地。还有小土地出租者，如有的男人参军了，家中又无劳动力，应以军属对待，不能动用他们的土地。

总之，在土地改革中，只有严格地执行政策，才能区别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农村中绝大多数，孤立地主阶级。当时的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佃农分得上等土地、贫农分得中等或上等土地；有的中农土地比较少，也适当“抽肥补瘦”，增加一定的土地。反对和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后，也酌情给地主分一定的土地，当然不是好的土地，这是让他们在劳动中自食其力和改造自己，这是因为要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的肉体，应该说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最后是丈量土地和分配土地，之后是复查阶段。可以说上述土地改革过程基本完成。

时至5月春天，田地里的油菜花黄灿灿地盛开，大家都感到欣慰。到了插秧时节，有时工作队员也下田赶着水牛犁田，有时农民手把手教我们犁田，我们希望是一个丰收年。

最后，土地改革工作团全体成员向江西老表一一告别，依依不舍。不少老表一直送我们到村头。工作团全体成员到东乡县政府休整和总结。然后，土改工作团沿

鹰厦铁路经上海北上，于1952年5月5日回到清华园。这一天正是马克思诞辰之日。

门头沟城子煤矿参观和学习 (大二暑假)

城子矿是一座私人开采的小煤窑。我们跟随矿工下井，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矿里巷道又黑又窄，掌面又很低。井下作业全部是手工劳动，我们戴上矿灯帽，拿着铁镐挖煤，不像现代的机械化采煤。

据了解，矿工的工资一般较高一点，伙食也较好一点。我们同矿工一道吃饭时，他们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是“两块石头夹一块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矿工们绝大多数背井离乡，家有老小，需要养家糊口。当时，在我心中很自然地想到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给我很大的触动。

清河棉纺厂进行抗美援朝宣传 (1950年寒假)

这次活动大家自带衣被，晚上在厂房席地而卧。当时纺织工人很是艰辛。据厂方领导介绍，纺织厂是用美国庚子赔款的很少一部分建起来的。纺织织布机还是40年前进口的，相当陈旧。厂里的工人90%是女工，三班倒，工资低，每天来回在织布机前要走几十公里。每天下班工后精疲力竭。但是纺织女工说，织布就是支援抗美援朝，支援国家建设，让人们都能穿上衣，盖上被。这确实是工人发自内心的话，深深地教育了我们。这一活动时间短，一周后就返校了。